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Media*


Huang Fayou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当代文学
传媒研究

黄发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识简称 PAPD）
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 985 工程项目经费资助出版项目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Media*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当代文学 传媒研究

黄发有 著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11&ZD11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10BZW098）系列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黄发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2-010254-9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传播媒介—关系—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G206.2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8813 号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1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插页 2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54-9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导 言 文学传媒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1
------------------	---

上编 文学期刊研究

第一章 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环境	21
一、创刊、停刊和复刊	22
二、从更名到改版	31
三、文学期刊与文学变迁	39
第二章 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改制	44
一、困境与突围	45
二、改制的模式	50
三、经验与误区	58
第三章 文学风尚与时代文体	
——《人民文学》(1949—1966)头条解读	64
一、文学导向	66
二、作者策略	72
三、文体偏向	83
第四章 从“边区文艺”到“西北文艺”	
——大区文学刊物《西北文艺》研究	102
一、《西北文艺》的创刊	103
二、配合政治任务	107
三、群众文艺路线	110

四、大区刊物的命运	115
第五章 《小说月报》与“选刊现象”	119
一、现时主义	120
二、中庸趣味	124
三、转载效应	127
第六章 《当代》与现实主义	136
一、薪尽火传的接力	137
二、时代见证与底层叙述	150
三、现实主义的两难	159
第七章 《收获》与先锋文学	168
一、锦衣夜行的实验	169
二、风云际会的共生	178
三、顺时随俗的变奏	183

中编 文学出版研究

第八章 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	191
一、弃旧图新	192
二、汇入巨流	198
三、改写自我	202
第九章 文学出版的转型与分化	214
一、三足鼎立的格局	215
二、商业造势的盛行	217
三、时尚化与规模化	225
第十章 数字时代的编辑理念	234
一、理想的垫脚石	235
二、商海里的传火者	239
三、媒介融合的信使	244
第十一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当代文学	248
一、辉煌与遗憾	249

二、复活的梦想	257
三、利润与信念	266
第十二章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色经典”	274
一、英雄生产线	275
二、青年生力军	281
三、幕后的辛酸	289
四、文学与宣传	295
第十三章 “文学新星丛书”的寂寞事业	303
一、交相辉映的繁星	304
二、生正逢时的盛举	309
三、难以为继的可持续模式	318
第十四章 “布老虎”的品牌策略	324
一、为娱乐开道	325
二、不变的慰藉	329
三、时文的宿命	334

下编 跨媒体传播研究

第十五章 跨媒体风尚与文学的前途	345
一、跨媒体传播与跨媒体写作	347
二、改编文化与空壳写作	354
三、印刷文学的衰落或重生	362
第十六章 新媒体环境下文学副刊的变局	370
一、大副刊路线与文学性淡化	371
二、小资情调的跨界演绎	376
三、报网融合与副刊的博客化	383
第十七章 媒介互动格局中的文学期刊	391
一、书刊联动	391
二、视觉转向	396
三、触网新潮	404

四、坚持深度	407
第十八章 影视趣味与小说流向	410
一、小说的脚本时代	412
二、独创性的困境	419
三、内心沉入黑暗	429
四、在挑战中成长	437
第十九章 网络文学的发展轨迹	448
一、图雅的传奇	448
二、审美的生意	454
三、混杂的活力	462
第二十章 网络文学的游戏化趋向	465
一、时尚的白日梦	466
二、独一代的文字游戏	471
三、消费寂寞	478
主要参考书目	485
后记	494

导言 文学传媒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传媒或媒介的定义往往较为宽泛,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只收了“媒介”一词,解释为“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①。如果不对传媒或媒介的概念进行必要的限定,容易把符号、渠道、信息与传播形式混为一谈,在论述中也容易产生歧义。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②。麦克卢汉的定义过于宽泛,譬如将服装视为“延伸的皮肤”,将时钟比喻成“时间的气味”,将汽车描述为“机器新娘”等等。为了避免混乱,本书中所提到的文学传媒是指以文学信息为主体内容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广播、影视、网络及其生产与传播机构。传播媒体中有私人机构,也有官方机构,像现代文学史上常见的同人杂志和同人书店就是私人机构,而具有官方色彩的传播机构在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文学史是作者、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结合形态,批评家与文学

① 《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5页。

②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页。

史家只是占少数比例的、专业的读者群。作者本身同样需要阅读作品,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算是健全的文学史。但是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是指1949年以来的大陆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中,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因袭了传统的文学史观念,一直偏重对思潮演变的审视和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即将文学史理解成了作家作品的罗列史,忽略了文学的功能史与作用史,忽略了文学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忽略了读者(包括批评家、学者、翻译家、编辑、文艺记者、文艺官员等专业读者)对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影响。

传统的文学史把文学局限在生产美学和再现美学的封闭结构之中,认为作者的创作活动和作品的客观价值决定了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具有历史的稳定性。我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互动作用,其价值的实现因为读者的内在品格、社会身份、文化时空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传播接受不仅能激活作品的潜在品质,还能生成新的审美特质与文化内涵。作品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兴衰必然反馈到文学的创造实践当中,使创作主体和文学思潮做出相应的调整。汉语文学与其他语种的文学相比,其传播接受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日益显著,对于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文学传播从单一的印刷传播转向以纸质文本、影像文本、网络文本为媒介的多元传播,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受到强烈冲击。在这种语境下,传播接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明显加强。

通过考察传媒文化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从传播接受的角度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探寻文学的传播接受对文学外部环境的重塑以及对文学内部结构的改变,能够拓展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修正文学史研究中的偏失,摆脱一些历史盲点和思维惯性的负面影响。对被以往文学史所遮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进行再解读,对曾经在文学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新的开掘,使文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环节。

文学传媒研究在最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堪称热

点。陈平原在写于2008年的《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一文中，针对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讨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据他的初步统计，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关于“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共有73篇，其中讨论报纸、杂志、书局的47篇，研究电影的13篇，探究电视、网络、广告的13篇。^①值得注意的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言，研究现代文学媒介的选题要多于研究当代文学媒介的选题。在研究报纸、杂志、书局的47篇论文中，只有4篇研究当代的印刷媒介。与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相比，现代文学传媒研究显得更加成熟，也更为系统。在现代文学传媒的研究领域中，张元济、张静庐、邹韬奋、茅盾、赵家璧、巴金、叶圣陶、丁景唐、黄源、柯灵、黎辛等著名编辑家的回忆录，唐弢、黄裳、姜德明、倪墨炎、陈子善等的书话，陈平原、吴福辉、王晓明、刘增人、封世辉、朱晓进、李怡、陈万雄等的报纸副刊与文学期刊研究，杨扬、朱金顺、商金林、金宏宇、王建辉、龚明德、姜涛等的文学出版与版本变迁研究，范伯群、孙郁、周海波等对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关系的考察，王本朝、马以鑫、栾梅健等对文学制度与文学接受的研究，立体地揭示了媒体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多元互动。就海外汉学界而言，李欧梵、樽本照雄、贺麦晓、张英进等人的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都有独到之处。

现代文学传媒研究之所以比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更为深入，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其一，现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历史更长，积累较为深厚。由于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是研究文学史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做出成绩的学者对《新青年》《晨报》副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和《小说月报》等重要的史料可谓烂熟于心。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叶子铭等老一辈学者在指导研究生时，都把阅读原始报刊作为一个新手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这就在现代文学学术界奠定了一种优良传统。其二，现代文学的思潮与流派，往往以报刊和书店为话语平台。也就是说，要理清思潮、流派的来龙去脉，无法绕过文学传

^① 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1页。

媒。建国以前的文化期刊与出版社大多为同人组织或民营机构。同人性质的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创建与发展大多围绕着参与者的兴趣展开。作家与同人期刊的关系也极其密切,鲁迅、茅盾、徐志摩、叶圣陶、巴金、沈从文、丁玲、胡风等都是著名的文学编辑家,文学研究会、学衡派、创造社、新月社、语丝派、现代派、七月派等重要的文学社团和流派往往以同人期刊为核心。民营出版机构在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功不可没,商务印书馆、良友图书公司、北新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局、生活书店等出版机构都曾以独特的出版实践,在艰难的局势中推动了文学的创造与探索。其三,印刷媒介在现代文学阶段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代文学传媒的媒介格局越来越复杂,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令人目不暇接,不断冲击并改塑文学生产的格局,这难免使习惯于纸面阅读和作家作品分析的研究者们感到不适应。而且,尽管在“文革”中出现了历史的断层,但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当代文学报刊和出版机构都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出版周期逐渐缩短,体量不断增大,而且当代研究的时间下限还在永不停歇地向前延展,这都给研究者带来新的挑战。

当代文学传媒的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最近几年才渐入佳境。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与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学与传媒的密切关系,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得到不断的拓展和深化。80年代中期以来,黄秋耘、韦君宜、秦兆阳、范用、袁鹰、沈昌文、何启治、黄伊、许觉民、龙世辉、朱正、范若丁、王维玲、崔道怡、张守仁、涂光群、章仲锷、聂震宁、石湾、程永新、潘凯雄、路英勇、林建法、何锐、宗仁发、孙晶等编辑家的著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①,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和《问题与方

^① 在潘旭澜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收入了大量文学机构、文学会议、当代文学政策的主要文件、文学报刊方面的词条,附录中还有“1978—1991全国文学奖一览”和“文学刊物刊名变更情况一览”等内容,这本来是他主持编写当代文学史的资料准备工作,遗憾的是,他构想了很长时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法》^①,陈思和的期刊出版研究以及主编“火凤凰”和《上海文学》的实践,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②,施战军的《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研究,吴俊的《人民文学》研究,程光伟的《文艺报》和诗歌传媒研究,李频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及其研究期刊的多种著作^③,还有靳大成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陈霖(林舟)的《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李明德的《仿像与超越: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陈伟军的《传媒视域中的文学》^④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考察印刷传媒与文学变迁的复杂关系。在台湾地区文学传媒研究领域,李瑞腾、向阳、须文蔚和美国的张诵圣等学者,都有深入思考和不凡见解。戴锦华、张颐武、尹鸿、周星、陈晓云、陈犀禾等对影视文化、影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南帆、欧阳友权、黄鸣奋、邵燕君、马季等对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学的研究^⑤,赵勇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蒋述卓和李凤亮主编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陈定家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单小曦的《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张邦卫的

①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编辑茅盾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期刊策划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大众期刊运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李明德:《仿像与超越: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伟军:《传媒视域中的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欧阳友权:《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岳麓书社2009年版;黄鸣奋:《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马季:《网络文学透视与备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媒介诗学》^①等著作从文艺理论的层面考察媒体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影像与网络传播及其影响文学的方式已经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课题。

总体而言,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充满活力,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现有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不少著述只不过是披着“传媒”外衣的作家作品分析,还有一些著作是纯粹以现成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从“十七年”到80年代,当代文学史上有大量内部资料,包括内部刊物和内部印刷品。“文革”期间流行的手抄本和各种小报,也是当时特有的现象。进入新时期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诗歌民刊,也为当时的文学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要深入研究当代文学传媒,不能忽视这些材料,因为它们记录了当代文学的另一副面貌,呈现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二,在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发展极不平衡。期刊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盛行的是重要个案的研究,《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成为研究的焦点^②,对边缘期刊缺乏关注,对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历史的整体把握亟待强化和深入。当代文学出版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很多学者都会在作家作品论或学术书评中,对文学出版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简要评述,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较为少见。现有成果中,出版人的回忆文字鲜活灵

① 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蒋述卓、李凤亮主编:《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定家:《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单小曦:《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郑纳新:《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武新军:《意识形态结构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报〉(1949—19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谢波:《媒介与文艺形态:〈文艺报〉研究(1949—1966)》,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蔡兴水:《巴金与〈收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动,但学理性不足,而专治出版史的学术著作往往忽略了文学的专业特性。近年有一些年轻学者对个案或某一个侧面入手,进行深入考察^①,这或许是文学出版逐渐向前推进的动向。当代文学副刊的研究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这或许和副刊在新媒体语境中的衰弱有关,除了袁鹰的《风云侧记》和沈扬的《朝花怀叙录》,其他研究副刊的著述多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所写,偏重考察副刊的编辑形式和传播策略,对其文学风格与审美取向的分析较为浅显。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论著剧增,但研究者重点关注的仍然是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问题,关于影视风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渗透,成果较少,现有成果多停留于现象层面,对于影视叙事对小说叙事的替代,视觉逻辑对语言艺术的侵袭,还有待深入和细化。其三,不少学者将文学的传播接受作为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对文化语境的分析,缺乏对受众的群体构成和审美趣味的具体考察,罕有对媒体调节和配置文学资源的流程、功能和基本规律的动态考察。学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一些研究文学接受史与文学传播学的论文,甚至表现出剪贴与拼凑相关学科知识的倾向。

二

文学传媒研究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兴领域,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呈现出一片乱战的局面。基于此,对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探索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是推动文学传媒研究走向深入的基础工作。我个人认为,文学传媒研究的方法,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① 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钱振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一,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文学传媒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学术领域,当然应该从新闻学、传播学的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学说中吸取营养,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也有助于认知的深化。就理论的亲缘性而言,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与观点,对研究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当然,生吞活剥外来理论的话,总是难有创见。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由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姚斯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来的,其代表人物姚斯、伊瑟尔、福尔曼、普莱森丹茨、施特利德、瑙曼等均为德国的文艺理论家和教授,姚斯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伊瑟尔的“暗隐的读者”“召唤结构”和“游移视点”,瑙曼的“接受前提”等概念与阐释,在反思传统文学研究的弊端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另一片天地。与接受理论相互呼应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崛起于欧美,吉布森的“冒牌读者”说、普兰斯的“叙述接受者”理论、里法泰尔的“超级读者”概念、斯夸尔和威尔逊的阅读反应实验研究、菲什的“感受文体学”理论、普莱的“内在感受”说、乔纳森·卡勒的“文学能力”说,从不同角度围绕着文本这一核心,分析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大大提升了读者在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有力地拓展了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研究视野。但是,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接受史在西方学界同样罕见。将文学的传播史与接受史有机地进行整合,更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文学传播学与文学接受史都是正在生长的学科,还需要逐步地完善,而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公众信息的传播接受又有很大区别,因为文学的传播接受包含一个审美再创造的过程。

研究文学传媒,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以原始材料为入口,考察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卢卡奇、戈德曼、齐美尔、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本雅明、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埃斯卡皮、波德里亚

等人在文化社会学、文学社会学领域的观点,都会提示我们传媒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各种力量交汇、冲突的空间。正如陈平原所言:“布尔迪厄等人的论述,当然值得借鉴,只是不该满足于‘挪用’,而全然放弃反省、批判、校正的权利。若辛辛苦苦收集大量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安德森所言不虚,报刊或小说确实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此类‘主题明确’的论述,很难有大的发展前景。”^①必须注意的是,文化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大多关注文化、文学与外部力量的关系,忽略了文学的内部研究,缺少对文学内部规律和特殊性的探究。文学传媒研究不应“去文学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应当凸显文学性的层次感和立体效果,而不是消解文学性。正如韦勒克所言:“我明白批评需要不断地从相邻学科中汲取营养,需要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神学的洞察力。但是我也赞成那些反对无限度地扩张批评边界以致失去了中心任务——文学艺术的观点。”^②

国内的新闻事业史研究,与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有交叉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像方汉奇、丁淦林及其后辈学者都有丰硕的成果,对他们的成果的借鉴,有益于深入分析文学传播的模式与特性,透视文学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的异同。文学传媒研究必须将媒体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立体考察,要重点关注文学元素与文学性的生成方式与内在构造。对各种相关理论的兼收并蓄,都必须以发掘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史料、掌握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前沿成果作为基础,避免将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剪贴与拼凑,真正给当代文学研究引来源头活水,实实在在地将文学的创造过程与传播接受置放在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多元的文化系统中,进行全景的、立体的研究。

第二,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文学传媒研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对象作

① 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7页。

② Wellek R,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43.

为媒介的特性,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象又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因此,研究文学媒介不能无视其特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大众媒介。研究者应当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对现有的史料进行整理,并对一些可疑史料进行甄别与证伪工作。关于当代文学,有不少史料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牵涉到文坛恩怨的相关资料,常常是站在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各执一词,这从楼适夷与夏衍围绕着冯雪峰的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论就可见一斑。自从《新文学史料》创刊以后,这种恩怨争讼并不鲜见。因此,围绕这些问题,文学史家应该对一些可疑史料进行甄别与证伪工作,在引用史料时也应该做到“互证”,不能放纵个人好恶,片面地引述单方的自述。“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①。毕竟,在当事人在场时,有一些争讼还有澄清的可能,至少也能留下双方当事人和相关知情人的不同意见。在这方面,李辉、丁东、陈徒手、徐庆全、谢泳、陈为人等人这些年的辛勤劳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通过走访当事人与知情人,深入了解内情,同时发掘了不少档案、手稿、内部材料,丰富了文学史的细节,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历史描述和文化诠释。

最近几年我走访了一些代表性的编辑、作家、记者、个体书商、批评家和文艺官员,获得了不少宝贵的原始资料,这些信息与目前已经披露的书面文献形成了有趣的参照,甚至颠覆了我原来从书面获得的理解与认知。最为重要的是,那些采访对象所携带的感性的、活生生的生命信息,他们与传媒结伴的人生悲喜,使我成天研读的期刊、出版物、影视和网络作品,也感染了生命的灵动与活性,使我的研究不再是机械的、麻木的、缘木求鱼的文字游戏,而是灌注了一种动态的生命趣味。另一方面,因为长期留意,我搜集了大量内部期刊和印刷品,还有一系列不同时期的稿费单据和出版合同,像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会议简报,就为我在撰写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论文时,提供了鲜活的细节和丰富的材料。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也在无意中搜

^①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2页。